



建党初期培养党团干部的学校

邱会生

红色记忆

在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起义路素波巷30号的广州市第十中学内，矗立着一栋红墙绿瓦的两层小红楼，这里是广东省立宣讲员养成所遗址所在地。广东省立宣讲员养成所（以下简称“宣讲员养成所”）是中国共产党在建党初期创办的培养党团干部的学校，也是广东第一个党支部诞生地、广东早期党团组织的主要活动基地，见证了党早期在广东领导的重要革命活动。

1920年10月，盘踞广州数年的桂系军阀被粤军驱逐，广东政局趋于稳定。1920年底，陈独秀受邀出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主管广东教育改革，宣讲员养成所便是在此期间开办的一所公办中等以上学校。1921年1月，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召开会议，议决筹设编译局、宣讲员养成所、贫民教养院、劳动补习学校。宣讲员养成所的招生计划确定为：招生分专门班和通俗班两种，设专门班一个、学制一年，通俗班两个、学制半年。生源主要由各县选送，学习期满后，在省招考者由教育委员会分派职务，各县选送者派回各县工作。7月初，又增加在广州市特招一个专门班和一个通俗班。宣讲员养成所于1921年8月开学，地址设在广州素波巷内。宣讲员养成所由广东省教育委员会直接领导。陈独秀、谭平山和广东党团组织

的活动多与宣讲员养成所有密切关系。1921年春，广州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党的一大召开前，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开展活动较为分散，或在谭平山家中，或在《新青年》广州发行机关昌兴街，或在宣讲员养成所。党的一大之后，随着工作推进和组织的壮大，宣讲员养成所成为广东党团组织的重要活动地点。1921年8月，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在宣讲员养成所召开党员大会并邀请党外积极分子梁复燃、刘尔松、阮啸仙、周其鉴等十余人参加。在听取党的一大会议精神后，大会宣告中国共产党广东支部正式成立，隶属中共中央局。随着党员人数的增加，遭中央指示，1922年6月，中共广东支部扩大为中共广东区委。1922年初爆发香港海员大罢工，回到广州的香港海员在素波巷成立了广州海员工会，广东支部把宣讲员养成所辟为广州海员工会与各界通信、接受捐款的联络机关。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一些活动也多在宣讲员养成所谋划。据第一届通俗班学员张贵宽回忆，“昨日（1922年2月10日）下午，社会主义青年团在本所开会，团员到会者九十余人，以本所学生为多”。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刊物《青年周刊》自1922年3月7日第二号起，出版通讯处设在宣讲员养成所。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决定在广州召开后，宣讲员养成所便成为团一大的筹备处。据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部分团员回忆，“团成立前几个月在素波巷宣讲员养成所内开了很多次会议酝酿”。1923年5月，党中央南迁来穗，准备召开党的三大，宣讲员养成所也曾作为党的三大的筹备处。因此，宣讲员养成所对广东党团组织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这里不仅留下了许多革命先辈的足迹，也见证了党史团史上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发生。

宣讲员养成所虽然名为广东省公立学校，是当时著名的“中上七校”（指当时在广州的七所中等院校）之一，但也是广东共产党组织在建党初期培养党团干部的学校。据梁复燃回忆，“‘宣传（讲）员养成所’，主要是培养具有共产主义理论知识的人才，培养向广大工农群众进行革命宣传，传播马克思主义知识的宣传员”。宣讲员养成所的工作主要由谭平山、谭植棠、谭天度等共产党人负责，其他教员主要来自广州其他高校，多为当时社会名彦。宣讲员养成所的课程除了一般的文化知识——“有政治、历史、地理、评议、社会教育和逻辑学等”，功课的内容还包括“反帝反封建，社会主义，群众运动，阶级斗争，宣传的方式方法等，新文化也讲”，以提高宣传干部的政治理论水平。从宣讲员养成所毕业的许多学员走上了革命道路，成为广东早期的党团骨干。根据1921年11月印制的《广东省立宣讲员养成所同学录》统计，第一届专门班学员有79人，通俗班80人，他们的年龄主要是在18—35岁之间，如黄学增（广东农民运动领导人）、刘琴西（东江地区党组织领导人）、黄觉群（龙川党组织创建者）、方汝楫（东江特委副书记）等。可以说，宣讲员养成所是当时培养党团干部的摇篮，为中国共产党在广东各地开展革命打下了良好基础。

1922年发生陈炯明兵变，广州政局陷于持续动荡之中，至1923年夏，宣讲员养成所停办。此去经年，岁月流逝。1928年，兴华中学（广州市第十中学前身）在宣讲员养成所遗址上重建了一栋小红楼，1995年，经谭天度指认确定为宣讲员养成所遗址所在地。2021年4月15日，广东省立宣讲员养成所遗址成为广州市文物保护单位。经修缮，小红楼一楼复原了当年的广东省立宣讲员养成所课堂，二楼布展了广东共产党早期组织暨广东省立宣讲员养成所遗址展览——“南粤曙光”。走进这里，仿佛回到百年前建党初期的峥嵘岁月。

广东省立宣讲员养成所的办学历史虽短，但它在建党初期为党培养了一批广东革命骨干，它的办学实践在党的干部教育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位于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起义路素波巷30号的广东省立宣讲员养成所遗址

类书：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朵奇葩

甘根华 龚齐珍

类书是中国古代百科全书和资料汇编式的工具书。中国古籍按内容分为经、史、子、集四大部类，《四库全书总目》曰“类事之书，兼收四部，而非经非史、非子非集”，认为类书既不属于经史，也不属于子集。从现存类书来看，它们广泛辑录古代天文地理、人物典故、诗文词语、名物史实、典章制度等各方面知识，蕴含丰富的史学和文学价值。

类书编撰源远流长

中国古代类书编撰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大多数学者认为，其起源可溯源到秦汉时期，秦代吕不韦所撰《吕氏春秋》，是类书早期的雏形。到了三国魏时，我国第一部具有真正意义的类书——《皇览》问世。《三国志·魏书》记载：“诸儒撰集经传，随类相从，凡千余篇，号曰《皇览》。”它具有类书广集群书、述而不论和随类相从的特性，因此无论从内容还是体例编排、篇幅上都可称之为类书，也是中国古代类书真正的起源。宋代王应麟的《玉海》中说：“类事之书，始于《皇览》”。可惜的是，《皇览》至隋末唐初就已全部亡佚，但引用其条目的古籍尚存。如《太平御览》引用20条，《水经注》引用13条，唐代《初学记》和《艺文类聚》皆引用了其条目。到两晋南北朝时，帝王普遍重视搜求有参考借鉴意义的旧事、典故以资政，于是类书之体开始兴起。其中比较著名的有两部：一是北魏道武帝拓跋珪执政时命令崔安编撰的《帝王集要》。据《隋书》记载：“《帝王集要》三十卷崔安撰”。后人也都认为它是一部关于政事历史的专业类书。二是北魏宗室、对文史多有涉猎的元晖牵头编撰的《科录》，这部书被后代学者认为是“实纪事本末一体之滥觞”。《魏书》记载，元晖“招集儒士崔鸿等撰录百家要事，以类相从，名为《科录》，凡二百七十卷”。不过，由于隋代以前的整部类书都已失传或亡佚，它们虽有部分佚文传世，但也难以看出其本来面目。

唐宋两代是古代类书编撰的发展时期。当时社会的安定和经济的

发展，给类书的编撰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据统计，在唐代，官修与私修类书同时得到了发展，约有一万余卷类书问世。尤其在宋代，雕版技术的应用和活字印刷事业的发展，加上相对宽松的文化政策，使宋代文化更加灿烂多彩，也使各种书籍包括类书更趋完备和丰富，《太平御览》等类书都相继产生于宋代。

明清两代则是古代类书编撰的繁荣时期。明代至清代中叶，以中国最大的古代类书《永乐大典》和现存最大的古代类书《古今图书集成》两部巨著的产生为标志，中国古代类书的编撰进入了繁荣时期。明清类书编撰的特点主要表现在：数量最多、质量较高、部头超大、种类繁多、类型完备。

古代四大类书

古代四大类书分别是《太平御览》《文苑英华》《册府元龟》《钦定四库全书》，它们中三部成书于宋代，一部成书于清代，其内容可谓各有特色、亮点纷呈。

《太平御览》最初名为《太平总类》，是由宋太宗赵昫敕令李昉、扈蒙等人辑录的书籍，编撰启动于太平兴国二年（977年），经过六年多才成书，全书一千卷。据史料载，书成之后，赵昫每天看三卷，一年内看完，也就是说，他是这套书的第一读者。全书以天、地、人、事、物为序，分成五十五部，囊括政治、军事、科技、地理、人文、宗教、皇王等，它的特点众多，主要有：一是体量大。该书篇幅达一千卷，被公认为是现存古代类书中保存和辑录五代以前古籍文献最多的一部书。二是首次设立皇王部。全书专释“皇王部”四十一卷，与全书一千卷的鸿篇巨制相比，虽然所占比例不多，但对君主和君权的认识有所体现。

《文苑英华》是古代诗文总集，属文学类书。宋太宗赵昫命李昉、徐铉、宋白等20余人共同编纂，成书于宋雍熙三年（986年）。全书上起萧梁，下迄五代，选录近二千二百位作家的近两万篇文章，所收唐代作品最多，约占全书的十分之九，成书时一千卷，可谓卷帙

浩繁。编修时讹误较多，体例亦嫌驳杂，后又几经勘校。南宋宁宗庆元元年（1195年），宰相周必大致仕后组织校勘《文苑英华》，并亲自主持完成刊刻。他所刻的《文苑英华》是此书第一个刻本，也是宋代唯一的刻本，其开本宏朗，刻成后进呈内府，内府用黄绫装封，庋藏于南宋皇家藏书楼——缉熙殿。当年一千卷巨帙，每十卷装为一册，共计一百册。遗憾的是，《文苑英华》存世的不到总数的七分之一。

《册府元龟》是政事历史百科全书性质的史学类书。宋真宗赵恒命王钦若、杨亿等人于景德二年（1005年）开始编写，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编成。“册府”是帝王藏书的地方，“元龟”是大龟的意思，古代用以占卜国家大事。取书名为《册府元龟》，意即作为后世帝王治国理政的借鉴和参考。它篇幅近一千万字，共一千卷，其特点是将历代君臣事迹，自上古迄于五代，取材以正史为主，按照人物阶层身份，分门别类，以时间先后排列，目的是“为将来典法，使开卷者动有资益”。

《钦定全唐文》简称《全唐文》，是清嘉庆年间官修唐代（包括五代）文章总集，也是迄今最大的唐文总集，由文华殿大学士董诰领衔，阮元、徐松等一百余人参加编纂，成书于清嘉庆十九年（1814年）。该书同样是一千卷，辑录唐朝、五代十国文章共一万八千四百八十八篇，按文体分类编排。据现代学者所撰的《唐史史科学》《隋唐五代文学史科学》等书认为，《全唐文》搜集十分浩博，考证校勘较为精密。

古代类书的功能与现代价值

中国古代类书的功能，大致可以归纳为这样几点：一是用于资政，为帝王和官吏资政服务；二是作为资料汇编，为皇族和官僚学习文化知识、历史典籍提供便利；三是育人，为推行科举考试、选人用人服务。用于资政。拓跋珪命人编撰

《帝王集要》、赵恒命人编撰《册府元龟》是为资政，宋代《太平御览》和明代《永乐大典》的编撰亦是如此。宋太宗赵昫对《太平御览》甚为重视，他对丞相宋琪说：“史馆所修《太平总类》，自今日进三卷，朕当亲览。”宋琪担心宋太宗过于劳累，赵昫回答说，“朕性喜读书，开卷有益，每见前代兴废，以为监戒，虽未终尽记，其未闻未见之事，固以多矣。此书千卷，朕欲一年读遍，因思好学之士，读万卷书，亦不为难。”他亲自将书名改为《太平御览》，并在施政中引用《太平御览》中的史实，反映其编书目的也是为治国理政作参考。

作为资料汇编。明清两代统治者皆重视历史文化典籍，亲自敕令点校和整理历代典籍，于是明代《永乐大典》和清代《古今图书集成》等类书精品应运而生。明成祖朱棣赋予《永乐大典》的一个重要功能便是查阅便利，据明史著作《皇明通纪》记载，朱棣讲“天下古今事物，散载诸书，篇幅浩穰，不易检阅。朕欲悉采各书所载事物，类聚之而统之以韵，庶几考索之便，如探囊取物”。因此，他动员学士二千余人，编撰费时五年，编成两万二千多卷。《永乐大典》和《古今图书集成》吸收、改进和完善了历代类书编撰的形式、内容、方法和体例，从而成为历史资料汇编式的类书精品，为皇族和官僚的学习提供了便利。此外，诗文取材、科举考试、启蒙学习和文化教育也是古代类书的重要功能。

当然，随着历史和时代的变迁，社会和科技的进步，势必会造成古籍文献包括类书古今功用的一些差异，但类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功能不可磨灭。在今天的史学和文学研究中，类书依然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可称得上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朵奇葩。



感受古诗文里的母爱

梅会林

母爱是世界上最无私、最深沉的情感，是诗人笔下讴歌的永恒主题。展卷中国古代诗文史籍，那氤氲在其中的母爱，总让人久久感怀。从胎儿在母腹中孕育，到婴儿呱呱坠地，在生养抚育孩子的过程中，母亲付出了无尽的辛劳，孩子成长路上跌跌撞撞，更离不开母亲无微不至的关爱和呵护。“万爱千恩百苦，疼我孰知父母”，“自打一下偏疼，人说一句偏怨”，这是明代吕得胜、吕坤父子写在《小儿语》中的话，道出了天下父母对孩子的无限疼爱。如果膝下儿女众多，为母又会付出怎样的心血和辛劳？《诗经》中就有这样的描写：“凯风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劳”，“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劳苦”，写满母亲养育孩子的辛苦，读来让人感念盈怀。

母亲，是儿女人生中的第一任老师。古往今来，很多母亲都全力以赴教导孩子读书上进。“亮节失青春，叹离鸱苦鸣，别鸱凄吟，五夜枪神深渗淫；思伦衰丹陛，忆弋雁失群，九能课读，卅年回首尚辛酸”，这是后人对欧阳修母亲郑氏勤苦教子的评价。欧阳修4岁时父亲去世，生活的重担全部落在母亲身上，郑氏含辛茹苦抚养子女成人，她“画荻教子”的故事传颂古今。清代学者蒋士铨的母亲也十分重视孩子的学习，蒋士铨在《严母教子》中写道：“记母教铨时，组绣纷纭之具，毕陈左右；膝置书，口授句读，唧唔之声，与轧轧相间。儿息，则少加夏楚，旋复持儿而泣曰：‘儿及此不学，我何以见汝父！’至夜分，寒甚，母坐于床，拥被覆双足，解衣以胸温儿背，共铨朗诵之；读倦，睡母怀”。这幅生动的教子画面，令人为之动容。希望子女平平安安、有出息，是天下母亲共同的期盼。南宋学者林希逸在《寄书后作》中写道：“几度题书客未还，归鸿节节度乡关。遥知一纸平安字，慈母灯前阁泪看。”一纸短短的平安信，母亲在灯前擦着眼泪一遍一遍看。孩子的成长，牵挂着母亲的心。韩愈在《谁氏子》一诗中描写了一个“不省心”的孩子：“非痴非狂谁氏子，去入王屋称道士。白头老母遮

门啼，挽断衫袖留不止。”既不痴愚也不癫狂的儿子，非要去王屋当一个道士。白发母亲倚着门框悲伤地啼哭，扯断了衣袖都留不住儿子。老母亲悲伤、绝望的境地，让人无限同情。

孩子长大成人，需要独立谋生，难免背井离乡，母亲总有千般不舍、万般牵挂。王安石的《将母》中有：“月明闻杜宇，南北总关心。”写母亲月圆之夜突然听到杜鹃的声音，想起离家在外的儿子，思念之情顿生的情形。白居易在《燕诗示刘叟》中写道：“一旦羽翼成，引上庭树枝。举翅不回顾，随凤四散飞。雌雄空中鸣，声尽呼不归。却入空巢里，啁啾终夜悲。”小鸭一朝羽毛长得丰满，飞上了庭院里的树枝，便再不回头，随着凤儿四下飞散。雌雄双燕在空中鸣叫，声嘶力竭也唤不回它们的孩子，只好回到空窝里面，悲鸣通宵不断。诗人借双燕的遭遇写出了儿女离家后父母的孤苦和牵念。

贤明的母亲是儿女人生路上的守护神，她常常以其良苦用心，耳提面命，教导儿子在为人处世上行正走端。《列女传·齐田稷母》中

记载：战国时，田稷任齐国宰相，接受了下级官吏的贿赂，拿回家交给母亲。母亲知道受贿的事后十分生气，严厉地斥责儿子收不义之财、对主君不忠的行为。田稷听后无比惭愧，立刻退还了财物，并主动向齐宣王请罪。田稷改过后深受器重，成为一代重臣，千载留名。

“人家见生男女好，不知男女催人老”，这是唐代诗人王建的《短歌行》中写母亲的诗句。人生一世，几度春秋。在养育儿女的过程中，父母慢慢老去。无私给予、不求回报，这种恩情唯有母爱。元代词人张之翰的《题致乐堂》中写道：“花有清香竹有阴，春风长在北堂深。细看慈母忘忧处，便是贤郎致乐心。”能够使慈母忘记烦恼与忧虑的，也就是她的孩子，贤良的孩子就是使慈母快乐的源泉。

母爱，人间第一情。浸润母爱的古诗文熠熠生辉，让我们在诵读中永远感念母亲的恩情。

